

十三经直解

第三卷 下

春秋公羊传直解

春秋穀梁传直解

葛根贵

编著

刘世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三经直解(第三卷·下)/葛根贵 刘世南

—江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7

ISBN 7-210-01648-1

I. 十…

II. 葛…

III. 古籍,十三经——哲学

IV. B221

十三经直解(第三卷·下)

葛根贵 刘世南编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宜春资料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年12月第1版 1996年7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0.625

字数:590千 印数:1—3000册

ISBN 7-210-01648-1/B·41 定价:41.00元 总定价:280.00元(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5号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8511534(发行部)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春秋公羊传直解 ■

前言	(1)
隐公	(11)
桓公	(39)
庄公	(69)
闵公	(114)
僖公	(120)
文公	(170)
宣公	(198)
成公	(227)
襄公	(255)
昭公	(293)
定公	(327)
哀公	(346)

■ 春秋穀梁傳直解 ■

前言	(361)
隱公	(367)
桓公	(388)
莊公	(411)
閔公	(450)
僖公	(454)
文公	(501)
宣公	(524)
成公	(542)
襄公	(565)
昭公	(594)
定公	(623)
哀公	(642)

前言

《公羊传》，又名《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与《左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三传之次第，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为《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后人讲三传，多以此为序。三传之经则有古、今文之别。汉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汉书·艺文志》：“《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汉书·艺文志》：“《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汉书·艺文志》：“《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班固于“《经》十一卷”下自注：“《公羊》、《穀梁》二家。”由此可知《左传》所据为古文经，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写的，《公羊传》所据为今文经，是用当时汉隶写的。今文经与古文经大体相同，然亦略有差异，今文经止于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古文经则止于哀公十六年夏“孔丘卒”。前人或谓今文经较古文经为可信。《春秋》与三传，本是各自刊行，后来才经传合并，先经后传，以传附经。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中，《公羊传》为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把《公羊传》配合于《春秋》经文各句之后，可能始于徐彦。

《公羊传》的传授，最初是口耳相授。《汉书·艺文志》说：“《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何休也认为“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见《春秋公羊解诂》

隐公二年)。而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徐彦《疏》所引戴宏《序》则说：

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

但戴宏说不无可疑。《公羊传》于隐公十一年、庄公十年、定公元年三引“子沈子曰”，于庄公三十年引“子司马子曰”，于闵公元年引“子女子曰”，于哀公四年引“子北宫子曰”，又于庄公三年、二十三年、僖公五年、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引“鲁子曰”，于文公四年引“高子曰”，且于桓公六年、宣公五年两引“子公羊子曰”，可证《公羊传》未必出于孔门子夏的传授，托名子夏，不过是借以自重，其传授之先师亦不尽为公羊氏，沈子、司马子等均传授之经师。至于说《公羊传》由公羊寿与其弟子胡毋子都于汉景帝时写成定书，则大致可信。

《春秋》寓意深而文辞约，往往假事以托义，其内涵全赖三传补苴张皇。《左传》解释《春秋》，以叙事为主，通过对历史事变的记述，让人们去理解《春秋》的内涵，甚至有无经之传，超出了《春秋》原文，而解释《春秋》“书法”的话却不多。《公羊传》则与《左传》完全不同，通篇为答问体，以答弟子问的形式，着重围绕《春秋》经文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而不注重叙述史实。二传所以释经者异，所释之义亦多有不同。所以前人说，《左传》是史学，为记载之传，《公羊》是经学，为训诂之传。此即二传之大较。

《公羊》释经，重在属辞比事，从文字上寻绎经文书法的异同，探究其所以异同之意，比较、归纳、发掘其义例，从而阐发《春秋》大义。如：

《春秋》贤者不名。微者亦不名。（襄公二十九年夏、隐公元年秋）

君存称世子，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庄公

三十二年冬)

女在其国称女，在途称妇，入国称夫人。(隐公二年秋)

将尊师众称某率师，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卑师少称人，君将不言率师。(隐公五年秋)

大夫弑君称名氏，贱者穷诸人；大夫相杀称人，贱者穷诸盗。(文公十六年冬)

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庄公十年秋)

称国以弑者，众弑君之辞。(文公十八年冬)

称盗以弑者，贱乎贱者也。(哀公四年春)

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僖公五年春)

称国以杀者，君杀大夫之辞也。(僖公七年夏)

称侯而执者，伯讨也；称人而执者，非伯讨也。(僖公四年夏)

《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庄公二十八年春)

复归者，出恶，归无恶；复入者，出无恶，入有恶；入者，出、入恶；归者，出、入无恶。(桓公十五年夏)

得意致会，不得意致伐。(庄公六年秋)

偏战者日，诈战不日。(僖公二十二年冬、三十三年夏)

诸如此类，在《公羊传》中比比皆是。《公羊传》认为《春秋》是经孔子整理修订而成，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以一字为褒贬，含有微言大义，既有“善辞”、“内辞”、“君子辞”，又有“篡辞”、“当国之辞”、“讨贼之辞”，尤其是对人物的称呼意在褒善贬恶，集中体现了《春秋》书法之精蕴，故而着力发其义例。《公羊传》还总结出《春秋》贬责人物有讥、贬、绝的科条，讥为轻，贬为重，绝最重。其原则与方式则是“择其重者而讥”(庄公四年冬)，“贬必于重者”(僖公元年冬)，“不待贬绝而罪恶见者，不贬绝以见罪恶也；贬绝然后罪恶见者，贬绝以见罪恶”(昭公元年

春)。

《公羊传》着力发掘《春秋》义例，时有一言之发，众例具举的作用。宣公十八年秋七月经文：“甲戌，楚子旅卒。”传文：“何以不书葬？吴、楚之君不书葬，辟其号也。”此说甚切《春秋》旨意。《春秋》一书对于中原诸侯，凡书卒者常例书葬，虽滕、薛诸小国也不例外，唯独对吴、楚之君书卒而从不书葬。春秋之时，吴、楚都是强国，均曾称霸于诸侯，只因二国之君僭称“王”，《春秋》为正名分，避而不录其葬。又如隐公六年秋传“首时过则书”，八年秋传“卒从正，而葬从主人”，桓公四年春传“常事不书”等等，都言之成理，信而有征，于《春秋》有彰阐之功。所以宋人胡安国评论说：“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穀梁》。”清人孔广森说：“《春秋》有非常之文，必有非常之议，盖唯《公羊》得之。”但是《公羊传》不重史实，专从文字上钻研、发掘大义，其所谓微言大义，时或自逞胸臆，未必尽合《春秋》本旨；其所立义例，时而不能自圆其说，流于穿凿附会。譬如《公羊传》认为《春秋》书法有讳笔，并归结为几条原则，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闵公元年冬），“内大恶讳”（隐公十年夏），“为中国讳”（襄公七年冬）。此论一出，对后世产生极大的影响。揆之经文，固多文从理顺、可成一家之言，但也并非处处都合经旨，也有令人费解、扞格难通的。所以宋人叶梦得批评《公羊传》“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

任何一种学说，都有其演变性。后人说“《公羊》大义”，往往兼指《公羊传》与“《公羊》学”。所谓《公羊》学，就是历代学者研究或利用《公羊传》而形成的一种学术或思想体系。东汉末年的何休是一位皓首穷经的《公羊》学家，他积十七年之功撰写的《春秋公羊解诂》，是《公羊》学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在《春秋公羊传序》里说《春秋》“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在《文谥例》及《春秋说》里则明确提出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

缺”之义。其中“三科九旨”最重要，历来被视为《公羊》大义的核心。所谓三科九旨，影响较大的说法有两种。一是何休《文谥例》说：

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二是徐彦《疏》引宋衷注《春秋》说：

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月、日，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旨也。（详见《公羊传》“隐公第一”徐彦疏）

据何休说，九旨即在三科之内，依宋衷说，九旨另在三科之外，但两说对于三科的阐释其实相通。所谓“存三统”，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相当，大意谓使鲁与周、商合称“三王”，即孔子修《春秋》是受命改制，所以借鲁为王，以示王法，而使周新黜入先朝之王，宋为殷商子孙，作为王者，其亡更在周前。所谓“张三世”、“异外内”，意谓以“所传闻”为“衰乱世”，以“所闻”为“升平世”，以“所见”为“太平世”，王道仁政当由近及远，故衰乱世应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可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则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但通观《公羊传》，虽有尊鲁之意，实无“王鲁”明文，虽宣公十六年夏传文有“新周”一语，却未必是何休所说之义。而如隐公元年春传文“王者孰谓？谓文王也”，僖公二十八年夏、冬传文“不与致天子”，成公元年秋传文“王者无敌，莫敢当也”等等，都是明明白白的尊周为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三见于隐公元年冬、桓公二年春及哀公十四年春，只是将《春秋》所记之事按时之远近大别为三，说明《春秋》书法因事之远近而有所不同（所以定公元年传又有“定、哀多微辞”

一说),并未截然区分为“三世”,更未把它与“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相配。至于“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说,见于成公十五年冬传。其实《公羊传》中,别内外之说随处可见,却未见有与“三世”相配的明文。要之,就《公羊》传文看,尊王攘夷的思想贯穿始终,并无“存三统”、“以《春秋》当新王”之类的明文。那么,能否将何休等人的三科九旨说一概目为穿凿附会、迂腐迷信的无稽之谈呢?恐怕不能。何休说当然有其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公羊》学,然亦有其师承渊源。西汉治《公羊》者,以董仲舒与胡毋生为最著。胡毋生就是与公羊寿共同写定《公羊传》的胡毋子都(“生”是“先生”之意)。而何休《春秋公羊传序》说:“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可见何休之前,《公羊》学者自有义例,而《公羊传》虽已写定,容有不载于《传》之微言大义的存在。我们今天读《公羊传》,自可见仁见智,择善而从。

后人又批评《公羊》好为妖妄淫邪之说,这也应当将《公羊传》与《公羊》学区别开来。《公羊传》本身之说灾异,初无荒诞之论。遍检二百四十二年传文,唯宣公十五年冬有“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之语,其余各条记灾、记异,正如清人王引之所说,“皆不言致此之由,亦不以为祸乱之兆”,“无一语及感应”(见《经义述闻》卷二十四),不过是因其罕见,非时人所可理解而已。而《公羊》学者自董仲舒已好言灾异之应,何休则杂引纬书,以阴阳五行说增益糅杂,遂迷其本来面目。如哀公十四年传“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何休《解诂》即引《春秋纬演孔图》中的“赤乌端门”之说以释之。清人皮锡瑞批评说“赤乌端门,事近荒唐,词亦鄙俚,《公羊传》并无明说,何休不应载入《解诂》。”我们今天读《公羊》,对此类荒诞之说大可置而不论。

《公羊传》作为一部今文经学的重要著作,曾在历史上产生

过重大的影响和作用。汉景帝将它立于学官，并设《春秋》博士。汉武帝时，董仲舒在《对策》中以《公羊》学奏言：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于是汉武帝用董仲舒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建元五年兴大学，置《五经》博士。而在《五经》中最重要的是《公羊传》，因为汉武帝需要借助《公羊》学说。《公羊传》第一句开宗明义就讲“大一统”，可为汉武帝引作政治统一的依据。《公羊传》主张“君亲无将，将而弑焉”（庄公三十二年秋），这种君臣大义思想也很适合汉武帝维护中央集权，维护皇权的需要。而《公羊传》所说的“复父之仇”、“复九世之仇”（庄公四年夏），也为汉武帝借口替高祖复仇而攻打匈奴提供了理论根据。可以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归根到底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尊《公羊》。《公羊传》是当时地位最高的一经。公孙弘便是治《公羊》学而官至丞相，封为平津侯的。董仲舒还曾引用《公羊》学来决疑断狱，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他老病致仕后，朝廷数遣廷尉张汤去向他请教政议。这在今天看来未免愚妄，但说明了当时经学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密切关系。魏晋以后，经学衰而文学盛，《左传》的影响大过《公羊》，以至《北史·儒林传》说“其《公羊》、《穀梁》二传，儒者多不措怀。”

《公羊传》的复兴是在清中叶以后。本来今文学的经典传到清末也只有《公羊传》一部重要著作（此外还有《韩诗外传》一书，但不甚重要）。清代治《公羊传》著名的，有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凌曙《公羊礼记》、《公羊礼疏》、《公羊问答》，陈立《春秋公羊义疏》。凭借《公羊》以复兴今文学的开创者是庄存与，他著

《春秋正辞》，不讲名物训诂，专讲大义微言。其后刘逢禄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春秋公羊何氏解诂笺》等书，着力发挥“张三世”、“通三统”的思想，认为孔子作《春秋》就是“绌周王鲁”、“受命改制”。道光、咸丰以降，清政腐败，纪纲废弛，内忧外患，社会激变。龚自珍、魏源等人利用《公羊》义例批评朝政，排诋专制，提倡“通经致用”，主张“更法改图”。戴望引用《公羊》义例注《论语》，王闿运治《公羊》而遍注群经，廖平精研《公羊》，皮锡瑞偏主今文。康有为席卷龚自珍、魏源之势，吸取廖平的一些观点，撰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打着《公羊》学派的旗号，以推阐孔子《春秋》大义的方式，鼓吹三世进化论，宣扬更法改制，为变法维新制造舆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则是将《公羊》学的三世说与《礼记·礼运》的“大同小康”论糅合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三个社会演进阶段，提出了一个由乱到治，实现太平盛世的空想蓝图。显然，清代复兴的《公羊》学已不是汉代的《公羊》学。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变革总是离不开托古，《公羊》学成为清末变法改制的依托和旗帜，良有以也。

总之，《公羊传》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著作。《春秋》三传各有违失，历史上曾为争门户而相互诋诋。然虚心而论，三传中，《公羊传》与《春秋》关系最为密切。《左传》长于叙事，《穀梁》稍嫌简略，而《公羊》虽不重史实却非绝无记事之文，虽有穿凿之义终不没其彰阐之功。《公羊传》问世后，《公羊》学成为今文经学学统的主流。今文经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春秋》为孔子借事明义的致治之说，偏重微言大义，从中寻求、推阐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从而既为皇权所用，以维护集权统治，也被维新者用来证明变法改制乃天经地义。这就使《公羊传》与《公羊》学对中国的政治史、学术思想史、经学史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历史是永远逝去的时间之流，但留给人们的思索却是永恒的。我们今天要研究中国政治史、学术思想史、经学史，《公羊

传》实不可或缺。江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十三经直解》，有助于人们究其内涵，体察古代文化之氛围及其价值取向，了解儒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洞察历史深层蕴藏的真谛，有助于批判、继承、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建设当代中国的新文化。

蒙江西人民出版社古籍编辑室之约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刘世南先生大力推荐，我不揣谫陋，承担了撰写《公羊传直解》的任务。我以为对于古代学说，不能一如以往的思维定式，从其论著中摘出某些说法和主张，然后予以肯定或否定，那样做极易造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应把握其整个思想体系及其嬗变，联系其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来进行科学的分析，而后才能有所扬弃。《公羊传》一书流传至今已两千余年，《公羊》学源远流长，自成体统，今作“直解”，自当不能强古人以从我。因此在本书的直解中力求既有所本，又不囿于成见，以“述”为主而慎加评论。即依据《公羊》学统，体现《公羊》本来内涵；同时又注意避其穿凿之弊；如有不同，略下己意。历代注释《公羊传》的著作中，清人孔广森、陈立所著堪称代表作，但已不能适应今天多数读者的需要。因此我在直解中，力求文字通俗易懂，为读者提供一个可读性较强的《公羊》白话读本。限于自己的才力、学识和本书的体例、篇幅，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尚未充分展开。即便是“述”，不够准确、不够透彻乃至讹误之处仍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指正。

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得到了刘世南先生的关心、启发和鼎力相助（刘先生本应与我共同署名），至于业师余心乐先生的关心、鼓励和奖掖就更不待言了。这些都使我难以忘怀。

葛根贵

一九九二年七月

隐 公

【经】元年春王正月。元年：指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 722 年。

【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君：君主。天子、诸侯都可称为君。此指鲁隐公。隐公名息姑（《史记·鲁世家》作“息”），周公旦之子伯禽的七世孙，鲁惠公的长庶子，母为声子。惠公卒后，他当位行君事。在位十一年。谥隐。始年：以新君年次纪年的第一年。《春秋》是一部以鲁史为主的编年史，以鲁君即位的年次分年纪事，上自鲁隐公元年（前 722），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 481），历十二公，共记二百四十二年的史实。新君在旧君去世的那一年继位，但该年仍以旧君的年次纪年。次年正月新君举行即位大典，才开始以新君的年次纪年，称为“元年”。○经文中的“元年”是什么？是新君鲁隐公正式当政的第一年。春者何？岁之始也。者：语气词，表示提顿。按《春秋》纪月，必于每季之首标明春夏秋冬四时。在“王正月”前标出“春”字，表明春为一年之始。王者孰谓？谓文王也。孰：谁。在句中做“谓”的前置宾语。文王：即周文王。姬姓，名昌。商末周族首领。据说他开始承受天命，其子武王推翻商纣的统治，建立了周王朝。○“王正月”的“王”指谁？指周文王。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曷（hé）为：即“何为”。正（zhēng）月：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古时王朝易姓，要改正朔易服色，即更改岁首之月 and 车马祭牲的颜色，以示“受命于天”，一切重新开始。夏正建寅，以今农历正月为正月；殷改建丑，以夏历十二月为正月；周改建子，以夏历十一月为正月。○为何要先称“王”再说“正月”？因为是周文王受天命而改建正月。《春秋》奉行周王正，以周历正月、二月、三月为春。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认为……重大。赞美之辞。○为何要强调是“王正月”？为了赞美普天下都统一于周王之下，按周正来统一历法。周王制定正朔，统令天下，万物都从这里开始。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对诸侯的通称。此指鲁隐公。鲁本

属侯爵。言即位：指《春秋》于新君元年正月书写“公即位”三字。参见桓公元年、文公元年。○此年既为鲁隐公元年，经文为何不写上“公即位”三字呢？这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平：整治，治理。反：归还。桓：鲁桓公，隐公的异母弟，后弑隐公而自立。○隐公原准备把国家治理好再让国还政给桓公，不写“公即位”正是要成全他这一心愿。曷为反之桓？○隐公为何要把国家交回给桓公？（下面回答此问）桓幼而贵，隐长而卑。长、幼：已成人、举行过冠礼，能主持宗庙社稷大事叫作长，反之则为幼。贵、卑：宗法制度中根据嫡庶亲疏区分的地位的高低。鲁惠公的元配夫人是宋国的孟子。孟子早卒，无子。媵姜声子代理内事，生隐公。后来惠公又正式娶宋武公的次女仲子，生桓公。仲子的地位高于声子，故曰“桓贵”、“隐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扳(pān)：同“攀”，援引，挽引。焉：语气词。且如：假设连词的连用。相：辅佐。凡：大凡。（上面几句是对“曷为反之桓”的回答）○桓公年幼但地位高，隐公年长但地位低。不过他们的母亲都不是惠公的元配嫡夫人，故尊、卑的差别很小，国中一般人没有谁知道。隐公已经成人并且很贤能，惠公死后众大夫推奉隐公，拥立他为国君。隐公此时如果辞让不立，则不知桓公将来能否一定立为国君。再说即使桓公现在就即位，也担心众大夫不肯辅佐年幼的国君。权衡再三，隐公才当位为君，其目的也是为了桓公将来能即位。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適(dí)：通“嫡”，嫡妻生的儿子。子：指庶子，姬妾生的儿子。○隐公年长贤能，为何不宜立为国君？承袭君位，先立嫡子，立嫡子根据其长幼为序，而不论其贤否，无嫡子而立庶子时，则根据其尊卑而不论其长幼。因此隐公不宜立。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桓公凭什么地位高于隐公？因为他母亲的地位高于隐公母亲。儿子因母亲的地位高而尊贵，母亲也因儿子地位显赫而尊贵。

【经】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昧。公：指鲁隐公。《春秋》行文单

称“公”，都是指鲁君。邾(zhū)娄：即“邾”，国名，曹姓，鲁国的邻邦。○鲁隐公与邾娄国君仪父在昧地举行盟誓。

【传】及者何？与也。会、及、暨，皆与也。会：会同。暨(jì)：连词，与，及。○经文中的“及”是“与”的意思。会、及、暨三词都是“与”的意思。曷为或言会、或言及、或言暨？会犹最也，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言会：如下六年夏“公会齐侯盟于艾”。言暨：如昭公七年春“暨齐平”。犹：解词释义的用语，释者与被释者意义近似。最：聚合。汲(jí)汲：心情急切的样子。暨暨：果敢坚决的样子。我：指鲁。○《春秋》记载鲁国与别国会盟，为何有时用“会”，有时用“及”，有时用“暨”？因为此三词虽然都和“与”同义，却又有区别。会，意义近似于“最”；及，有“汲汲”之义，表示我方主动要求会盟；暨，有“暨暨”之义，表示对方主动、我方不得已而决定与之会盟。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仪父：邾娄国君，名克，字仪父。名：用为动词，称名。称字：古人有名有字，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称人以字是表示尊重。○仪父是邾娄国的国君，经文为何直称其名？“仪父”是他的字。经文并未称其名，称其字是为了褒扬他。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与公盟者众矣，曷为独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为可褒奈何？渐进也。乎：同“于”。此其：代词连用，偏重于“其”。奈何：为什么，怎么回事。○隐公在位期间，与鲁会盟的不只一个邾娄国君，但仪父亲贤慕义，讲信修睦，率先与隐公会盟，表现出渐进的趋势，堪可赞扬，故而特意在此尊称其字，以示褒奖，以勉来者。昧者何？地期也。昧(miè)：通“蔑”，鲁地名，在今山东泗水县东。期：邀约，约定。○昧是什么地方？两君约定相见的地方。特意录下地名是表示重视，为盟应守信用。

【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鄢(yān)：本是国名，姁姓。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此时已被郑武公所灭。后改称鄢陵。参见成公十六年夏。

【传】克之者何？杀之也。克：战胜。○经文中的“克段”实际上是“杀段”的意思。这年五月郑伯杀了段。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郑伯：指郑庄公。郑国属伯爵，故称郑伯。庄公的父亲是郑